

◆ 安庆地理

杨桥老街

曹金如

杨桥老街在安(庆)枞(阳)公路杨桥段下面,长不足两百米,往南有一座不大不小的石拱桥,桥的尽头便是原桐城县杨桥区委区政府所在地,当年辖管着罗岭、杨桥、大枫、罗塘、花山五公社。

杨桥老街其实是单面街,一家铁匠铺最早落户在这里,后来才有木器社,紧挨木器社的便是缝纫社。之所以叫“社”,是因为它们属集体性质。最东头的饮食业和理发店,则平添了“街”的韵味。说是饮食业,其实也就一开间房屋,清早供应油条、烧饼和馒头,白天供应肉片汤。饮食业中间有张大老的四方桌,四条凳子是连体的。桌上通常放一大茶壶,旁边是码得高高的蓝边碗。饮食业里有两个常客。一中等身材的老年男子,花白头发梳成大背头。此人并非饮食业内服务员,但每天照例来到店里端茶倒水,见人很是热情。尽管如此,店里的会计还是冲着他吼:“请赶快出去,不能影响我们营业!”原来这是一位痴呆老人。另一位是街上有名的“讹头先生”。他三天两头就拄着拐杖来到店里“喝茶吟诗”。此人身材魁梧,不修边幅,夏天里常光着上身。他曾教过私塾,也在公办学校呆过。“讹头先生”见到学生模样的就主动凑过去问“大雪满天地,故为杖剑游”的出处,问“江上一笼统,井上一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黑狗身上肿”的由来,还会问“葬花吟”葬的是谁……学生对他敬而远之,把他视为第二个孔乙己。

安枞公路未通之前,杨桥街是个通衢。街不长,人流如织,最热闹的是每年送新兵入伍时节。来自全区五个公社的新兵身着军装,胸前佩带着大红花,在阵阵锣鼓声中,被送到区武装部。上世纪70年代末,杨桥

街开始扩建,街边建了许多店铺。东头拐拐处的补鞋匠小王,原本在家经营,后来便在街上开了个补鞋店。老余师傅,原来是流动照相的,见业务好,干脆也在街上租房,开起了“杨桥照相馆”。

杨桥放映队原本就设在区政府里。原先多半是露天电影,天气不好就很麻烦,“杨桥电影院”应运而生。是老百姓做义务工建成的。有了电影院,卖冰棒雪糕汽水、五香瓜子、茶叶蛋、香烟打火机的摊小点就多起来。人气一旺,就有人开起了饭店。“宜杨春”“溪上酒家”是街上最早的两家饭店。改革开放之初,商品流通量大了,街上摆摊设点的就多起来。尤其是做缝纫的,在街道旁随意设个点,铺上摆放着各种花色的布料,现扯现缝,很是方便。以前买化肥农药要凭票,自从有了“倒爷”,这些在农民看来比命根子还重要的东西就有指望了,不过价格要高出不少。

街上随处可见的就是小卖部和批发部。冰棒可以批发,鸡架、鸭架、海带、带鱼、冻虾可以批发。周边巫翁看到商机,把自家种的蔬菜拿到街上卖,一人一个固定位置,时间一长,那一块地便成了“菜市场”。先前“饮食业”内设的理发店,其实是工薪阶层的去所,因生意清淡,不久便关门了,取而代之的是“美容美发店”。“春芳发廊”开了杨桥美发业的先河,之后类似的发廊在杨桥街头层出不穷。上世纪90年代,乡镇企业异军突起,银粉厂、饮料厂、电器加工厂、模具厂等纷纷在杨桥落户。

如今老街的影子仍依稀可见。而最能佐证杨桥“老街”身份的当是“杨桥印刷厂”和“杨桥电影院”,它们还一直存留着。

◆ 流年碎影

在组织部的日子

黄骏骑

1984年机构改革,我由潜山县教委招生办副主任提拔为县委组织部副科级秘书。那时组织部未设办公室,秘书就相当于办公室主任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内当家”。组织部的办公地点在县委机关大院内,因而行政管理工作统一由县委办公室行政科主管。行政科定期召开院内各单位秘书参加的会议,研究制订环境卫生、住房管理、机关安全等方面的制度,进行督查落实。

行政科明确划分了各单位的“卫生责任区”。每周星期六上午,是机关统一的卫生大扫除时间。一上班,我就从储藏室里将锄头、扫把等工具搬出来放在走廊里,不用招呼,除出差在外的,部机关全体干部纷纷走出办公室,争相拿起工具参加大扫除,没有人借口手头有事而告假。三位部长一次不落地参加义务劳动。有来部里汇报工作的,没有急事,就请等一会儿,劳动结束再接待。寒冬腊月,北风呼呼地刮着,大家搓着僵冷的手干得起劲,有的在院子里清扫,有的在室内擦灰,有说有笑,不一会儿,个个额头沁出了汗珠。行政科还定期组织卫生检查,贴上不同颜色的“最清洁”

“清洁”“不清洁”纸条,如哪间办公室贴上了“不清洁”,那是件很不光彩的事儿。

行政科对机关大院的管理严格细致,从禁止放养家禽家畜、禁止骑车下坡到填写出差单,领取3毛钱的出差补助,须经单位财务负责人审批,可以说是事无巨细。对学校分配、工作调动到县委机关的单身职工,统一安排单间住房,配备单人床、桌椅、洗脸架、澡盆等生活用具,登记造册,一式三份,调离时,行政科派员参与移交,逐件清点,损坏赔偿,决不含糊。那一年,部里从乡镇新调入的一位同志,不懂规矩,在房间私自安装电灯插座,换了大灯泡,被管理员发现后,我立即上门向他说明水电管理制度,让其自己纠正。

县委组织部作为党员之家、干部之家、知识分子之家,承担了落实干部政策、知识分子政策的任务,每天来访者很多。部领导要求我们做到“一把椅子让座,一杯开水解渴,一番答复释惑”,绝不允许出现“门难进,脸难看,事难办”的现象。无论多么忙,对来访者我都热情接待,符合政策的,部里及时研究办理;不符合政策的,也要讲清道理,使之高兴而来,满意而归。

◆ 儿女情长

我的母亲

程仕玲

母亲出生于1928年农历9月29日。正是一个极度混乱、饥饿、恐慌、萧条的年代。母亲从出生起,就饱经风霜:3岁时死了妈妈,4岁时又死了父亲,她的奶奶绝望至极,跳河自尽,母亲凄惨的叫声惊动了路人,她的奶奶被从河中救了起来。从此以后,母亲就随着她的奶奶、小叔、小婶生活。

母亲的小叔家也有6个孩子,一大家子人靠小叔一个人卖芦柴维持生计。1937年,母亲长到9岁,抗日战争爆发,为躲避战乱,被送到她的乡下外婆家,此后便成为家里的好帮手。农村的灶台高,母亲站在小板凳上踮着

脚,烧饭洗碗,甚至学会了犁田打耙。母亲慢慢长大,男人干的活,她照样能干,她的勤劳能干,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。

母亲22岁时嫁给了我父亲,经街委介绍,母亲一行20人到胡玉美罐头食品公司工作,母亲吃得苦和累,20人中,只有母亲后来一人转为正式职工。她上班从不迟到,吃苦耐劳,年年都被评为“先进生产者”。母亲白天上班,晚上挑灯夜战,有时我一觉醒来,她还在一针一线给我们缝补衣裳。她贤惠通达,懂得人情世故,和左邻右舍相处几十年,从未红过脸。

母亲36岁那年,父亲不幸病逝,留下一大家老

上世纪80年代,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部里像我这样家属在农村的“半边连”干部占了三分之一,每到早稻插秧、双抢季节,组织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,安排我们回乡帮忙,短的一周,长则十天。端午、中秋等传统节日,各科室也自动调剂,让我们回家陪老人、小孩过节,工作由在城的同志顶着。县委机关食堂办得红红火火,一日三餐,县委书记、常委和普通职工一起,排队用饭票打饭,然后围坐在圆桌旁,吃得津津有味,没有谁搞一点特殊化。每年元旦,食堂会用“伙食尾子”为我们来一次大会餐。大家大碗喝酒,大块吃肉,一时间,猜拳行令,欢声笑语,好不热闹。那时还没有“公款招待”一说,来部办事的熟人,到了吃饭时间,由私人掏腰包在食堂里打碗饭吃。逢年过节,部里的双职工都要“轮流坐庄”,请我们单身汉到他们家做客。

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”有同志调离组织部,无论工作多忙,部领导都要主持召开欢送会。清茶一杯,情深意长。同事们依依不舍,争相发言,勉励离开的同志到新的岗位上,不忘组织部的优良传统,勤勉工作,奋发有为。每位调离的同志,可带走一个印有“潜山县委组织部”的公用茶杯,留作纪念。

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,只有6个月大,姐姐和两个哥哥都在上学,还有一个63岁的奶奶需要养活。中年丧夫,又正处困难年代,家里有这么张嘴吃饭,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。但母亲没有哀怨,而是用坚强独自支撑,带领我们老小捱过了艰苦的岁月。

后来我在石化厂工作。结婚以后把母亲接到我家。2011年农历正月初一,过年的欢乐气氛弥漫着我们这座滨江之城,我慈祥的母亲在经历了83个春秋冷暖之后,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。算起来,她和我们一家人生活了整整十七年。那也是母亲最为快乐、安心的十七年。

